

龟兹文化遗产

旅游地开发模式研究

主编 ◆ 吴培钦 杨兆萍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2BAH48F03）

龟兹文化 旅游地开发模式研究

主 编 ◆ 吴培钦 杨兆萍
副主编 ◆ 刘旭玲 韩 芳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开发模式研究 / 吴培钦, 杨兆萍主编.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643-3932-6

I. ①龟… II. ①吴… ②杨… III. ①龟兹 - 旅游资
源开发 - 研究 IV. ①K294.5②F592.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1503 号

责任编辑 杨岳峰
封面设计 米迦设计工作室

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开发模式研究
吴培钦 杨兆萍 主编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 146 号 610031)
发行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8
字 数	141 千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3932-6
定 价	40.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序 言

新疆在世界古代史上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地带，东面是中原文明，西面有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地中海文明等，西南是印度文明，这里自古就是世界多元文化交流和交汇的中心。

伴随着古代丝绸之路商道贸易的发展，龟兹成为多种文化的荟萃之地。这里在普遍信奉萨满教的基础上，又陆续出现了佛教、祆教、道教、摩尼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信仰。考古过程中发现的汉文、吐蕃文、西夏文、梵文、佉卢文、古和田文、吐火罗文、粟特文、叙利亚文、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阿拉伯文等多种文书，反映出龟兹是汉藏、印欧、阿尔泰等诸语系语言的汇合地。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无疑是一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含蕴了历史性、地域性复杂变化的背景，展示了古代西域复杂的文化面貌。

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与旅游有密切的关系，当代的旅游本身也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充分挖掘丝绸之路文化资源，既能展现不同民族文化的吸引力，也能促进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的共享，更能让这些凝聚着历史上各民族智慧的文化资源得以保护和传承。本书努力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龟兹文化的历史渊源、文化要素内涵和体系结构等方面深入分析了龟兹文化体系的构成、龟兹文化遗产的价值，并对龟兹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特征和资源评价等进行了阐述，提出了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开发的适宜模式，尝试用系统模拟的方法对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旅游开发模式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了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保护开发的对策建议，为文化旅游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该书整体上突出了以下一些重点内容：

龟兹文化体系：以宗教学和旅游资源学相关理论为基础，尝试构建龟兹文化体系，全方位挖掘整理研究龟兹文化体系的历史渊源、文化要素内涵和体系结构关系。梳理龟兹文化的起源、鼎盛、衰落和历史变迁；总结龟兹文化的突出特征及价值研究，包括石窟壁画、龟兹乐舞、佛寺建筑和龟兹文化

代表人物、文学作品、文化象征等。

龟兹文化遗产价值：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世界文化遗产价值标准，对龟兹文化遗产价值作深入分析，运用文化地理学、旅游学的相关理论，探讨了龟兹文化遗产的外延价值。

龟兹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模式：以旅游资源学相关理论为基础、文化地理学理论为指导，对龟兹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进行了特征分析和评价，借助模式集的评价工具，在对现有模式评价的基础上，构建了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的开发模式。从保护遗产原真性的角度，提出原真性遗址开发模式；针对龟兹文化体系中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石窟壁画反映出的特殊人文精神，提出了龟兹文化遗产实景舞台剧的开发模式；针对龟兹遗产地大量的考古遗址、古建筑等遗迹的保护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提出引入整合再现的文化产业园开发模式；针对龟兹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乐器、民俗手工艺流传至今的情况，提出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模式；对于未来龟兹数字遗产的发展，提出了数字化仿真模拟博物馆开发模式。这些对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龟兹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模式模拟及调控：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以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旅游开发为实例，构建旅游开发的系统动力模型，对旅游开发模式下不同的情景进行模拟，用得到的反馈对开发模式进一步优化，提出对策建议。通过实验分析，找出影响系统行为的关键因素，为旅游开发提供参考依据，以期对丝绸之路沿线文化旅游开发、文化资源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起到示范作用。

韩芳

2015-2-28

目 录

1 绪 论	1
1.1 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目的	1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4
1.3 研究的理论依据	12
1.4 技术路线	16
1.5 研究方法	17
1.6 创新点	19
2 龟兹文化体系	20
2.1 龟兹文化的界定	20
2.2 龟兹文化的历史渊源	20
2.3 龟兹文化体系的要素及内涵	26
2.4 龟兹文化体系结构	40
3 龟兹文化遗产价值分析	44
3.1 龟兹文化遗产特征	44
3.2 龟兹世界文化遗产价值	48
3.3 龟兹文化遗产的延伸价值	53
4 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资源特征与评价	56
4.1 龟兹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类型	56
4.2 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的资源特征	61
4.3 龟兹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	62
5 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开发模式	69
5.1 旅游开发模式的内涵	69
5.2 国内外旅游地开发模式探讨	69

5.3	旅游地开发模式选择及步骤	72
5.4	原真性遗址开发模式	76
5.5	整合再现的文化产业园模式	78
5.6	实景舞台剧模式	81
5.7	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模式	84
5.8	数字化仿真模拟博物馆模式	86
6	龟兹文化旅游地产业发展模式及调控机制	90
6.1	系统动力学	90
6.2	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建模的目的	91
6.3	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旅游产业的 SD 模型	92
6.4	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开发系统实证仿真	94
6.5	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开发模式的情景分析	100
6.6	调控机制	103
7	结论与展望	106
7.1	结 论	106
7.2	展 望	107
	参考文献	109
	后 记	120

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目的

1.1.1 研究背景

龟兹是丝绸之路中道的重镇，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越来越受到各方重视。2006年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我国与中亚有关国家开展了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2014年6月，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发起的“丝绸之路：起始段与天山廊道的路网（Silk Roads: Initial Section and Network of Routes of Tian-Shan Corridor）”项目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丝绸之路项目包括22处遗产点，其中龟兹有3处遗产点，分别是：克孜尔尕哈烽燧、克孜尔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

新疆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在几千年绵延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保存有内容丰富且独特的文化遗产，是丝绸之路上的众多文化交汇的重要旅游地，从历史建筑、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等方面展示了丰富的价值，能够为当地旅游开发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作为新疆历史文化和多元民族文化富集区，集中代表了古代中国和西域各民族的精神与文化，全面反映了中国多元的文化艺术形式。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基础较好，以库车县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旅游大区，旅游资源丰富，不仅有自然旅游资源也有文化旅游资源，综合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的资源基础、产业基础以及现有旅游产品的开发、市场现状，我们认为文化旅游才是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的核心旅游产品。所以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的发展传统观光旅游的基础上，应充分认识和利用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不断持续开发龟兹文化遗产旅游。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作为新疆旅游资源的窗口，其科学的跨越式发展必将大力推动新疆文化



旅游业的发展。

近年来,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在开发利用上已有一定的基础,但由于长期以来龟兹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内涵的挖掘不足,历史文化遗产仍停留在初级开发阶段,其旅游业的发展落后于丝路其他沿线旅游地。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良好的区位条件、经济条件和丰富的资源及其组合优势没有很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也没能很好地实现其经济、文化、社会效益。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如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未能科学地把握、梳理文化资源体系,造成旅游区的产品类型单一;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上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旅游资源整合不足;缺乏展示多元文化内涵的载体和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开发运营模式;经营、管理和保护措施相对落后等问题。同时,在理论研究领域,对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开发方面的研究也并不多见。因此,无论是从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发展现状还是从理论研究方面来看,本书的研究对于旅游业处于发展机遇期的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的文物保护乏力和文化传承难以为继的严重问题,通过合理的文化保护措施、旅游载体建设和功能的发挥,将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因此,对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的开发模式研究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地理分布上看,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主要包括天山南部支脉边缘及山间盆地,位于丝绸之路核心地段,具有精彩纷呈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龟兹文化旅游资源主要以佛教石窟、佛寺遗址、古烽燧、龟兹故城、屯田遗址、古驿站等历史文化遗址为主,此外,还有龟兹乐舞、流传于民间的歌舞、绘画、手工艺、口传文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其中,佛教石窟壁画在当时的最主要功能是佛教表达的工具,是佛教意识形态的体现,也是目前保留下来的龟兹文化的主要传承载体形式。龟兹石窟的文化遗产价值是它的佛教思想内涵和历史地位,这应该是龟兹石窟文化相关研究的根本命题和主攻方向,以往可供借鉴的跨学科研究的主要成果,偏重于艺术和考古及其开发利用的方面。因此,龟兹石窟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要提升原有的理念和方法,将龟兹文化遗产旅游研究从过去以石窟考古成果为主的研究视角,转移到将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以科学技术手段、艺术创作形式以及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再现展示给游客,使其全球突出普遍的文化价值转化为地方产业经济价值,这才是本书的研究目的所在。



1.1.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本书以龟兹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 以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 运用文化地理学、文化生态学、旅游资源学和历史地理学相关理论, 通过大量实地考察调研, 借助文献学方法、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等方法, 力求构建完整的龟兹文化体系, 梳理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的发展特征、运行机理和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模式及对策, 把握龟兹文化体系的结构、发展方向, 为龟兹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提供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依据, 从而进一步丰富旅游地理和文化地理研究的理论内涵。

(2) 实践意义: 通过对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的旅游开发模式进行对比、定性和定量研究, 可以为西部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提供极佳的范例, 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古代多元文化交汇地的文化遗产, 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旅游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的提高, 并对增强公众的国学研习意识, 提高文化旅游者的文化素养, 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实施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开发, 能带动整个新疆文化旅游的发展, 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1.1.3 研究目的

(1) 建立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旅游的价值评估和文化体系, 为科学地展示和保护龟兹文化遗产, 促进龟兹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适度开发与文化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及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方法依据。

(2) 结合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旅游资源与环境的特点, 建立旅游资源评估体系, 提出龟兹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模式和数字化理论模式, 为丝绸之路文化旅游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构建基本的研究框架体系。

(3) 研究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旅游资源发生、发展的前提、条件和过程, 资源吸引功能形成的机制、过程及其发展趋势, 旅游资源的形成受历史遗存、文化地域差异、宗教、市场需求、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4) 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 模拟龟兹文化遗产旅游地开发所涉及的动态和非线性的关系, 找到旅游地开发内在的系统行为, 通过实例分析, 找出影响系统行为的关键因素, 为旅游开发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以期为其他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地的开发、文化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起到示范作用。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文化遗产旅游研究综述

(1) 遗产旅游及其价值研究。

近年来,国内的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对遗产旅游开发和价值的研究,也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从遗产旅游产品、体验和需求心理等不同的视角展开了深入探讨。国外遗产旅游研究者对相关研究主题定义的研究也有别于国内研究,他们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了遗产旅游体验和遗产旅游内涵特征上面。如 Richards (1996) 对遗产旅游的界定,他认为遗产旅游可以是一种遗产体验活动过程,也可以是一种具体的旅游产品,旅游者在探求自己的旅游动机之前,就必须将遗产体验与旅游需求通过某种途径连接在一起; Moscardo (2001) 在他的研究中提出遗产旅游资源和遗产文化追求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产生的体验是遗产旅游的核心; Micheal (2002) 认为遗产旅游的发生不应该被看作是随机和偶发的旅游活动,而应该将其看作是文化需求心里推动的特殊社会行为; Poria 等 (2001) 认为遗产旅游可以看作是文化旅游者被遗产提名地激发出情感的一种现象。国内的遗产旅游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则更多的集中于对遗产保护前提下的开发研究。如吴必虎 (2002) 从地理学的视角,认为文化遗产旅游地的开发是当地进行资源转化的最佳途径,是政府进行资源配置的必然结果; 郭旃 (2002) 在其研究中指出,中国的遗产开发过程忽视了遗产地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提出了应将遗产的景区管理、遗产保护和遗产的管理权有机结合起来创新开发模式的构想; 李如生 (2002) 在他的研究中认为遗产的行政管理和监督以及为其设计的资源利用方式等都必须建立在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这样政府才能通过文化产业基金的引导,吸引社会资金进入,从遗产开发经营活动中获得更多的遗产保护资金; 郑孝燮 (2003) 总结了遗产旅游开发中出现的问题,着重指出目前遗产资源保护的迫切性和遗产资源的流失的严重性。

在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的价值研究中,国内外有明显的阶段区分,国外的世界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明显早于国内,现阶段的国外研究主要从旅游者对遗产旅游的感受入手,建立与不同遗产旅游地的联系,从而分析其在感受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如 Teo 和 Yeoh (1997) 认为遗产地吸引旅游者的动机不再是遗产旅游地的原真性,而是旅游者对目的地的期望; Ashworth 和



Larkham (1994) 却认为当下的遗产旅游产品是一种普通的商品, 仅仅是为了迎合旅游者的消费需求的产品而已。

国内的世界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和实践与国外有着阶段的差异, 所以国内学者试图分析遗产的内在的突出普遍价值, 将其作为旅游开发的内涵。陈倩、王全康 (2012) 在《巴渝古盐业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价值研究》中指出, 文化遗产价值研究应该重视遗产相关的文化系统认知, “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开发、依靠旅游所创造的经济价值能更好地保护古盐业遗产, 古盐业遗产得到保护后会反哺旅游行业, 为该行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最终达到双赢格局”。

综上所述, 虽然国内外学者所关注的视角有着阶段差异, 但是依然体现出学者们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去阐释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关于此类研究和讨论也很多。不过从总体上说, 目前的研究还都处在比较浅的层面, 文化遗产历经人类历史的变迁, 它的起源、发展、高峰和衰落都凝结到了价值层面, 所以对文化遗产的价值分析应该多从价值形成的体系结构入手, 分析人类突出普遍价值内在要素间的相互影响过程和机制, 以及他们的发展方向, 这些是未来文化遗产价值研究的重要方向, 也是笔者试图探讨和关注的重点之一。

(2) 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

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开发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开发模式的探讨和不同文化遗产地开发对策的分析, 也有相当的学者借助不同的方法对开发模式展开定量和定性的讨论。如梁学成 (2006) 关注了文化遗产价值内涵中的有形部分和无形部分的相关关系以及彼此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并且基于此, 提出了文化遗产旅游地的开发模式; 章尚正、董义飞 (2006) 从旅游产品的发展过程的角度入手, 以皖南古村落的旅游需求的演变过程为实证, 认为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应注意从大众化旅游产品过渡到小众化旅游产品和定制化旅游产品的设计, 这种旅游产品设计的发展阶段的分析对于一般的产品开发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孙丽萍、王艳平 (2005) 的研究阐述了遗产旅游产品设计的发展方向的观点; 李斌 (2012) 分析了“双世遗”武夷山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国外学者开拓了借助文化遗产旅游者的旅游体验来研究其特定的市场需求。如 Laws (1998) 主要关注遗产旅游市场的旅游体验和服务流程设计概念, 并对遗产旅游的有效管理和旅游体验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 Beeho (1997) 等应用栅格分析方法研究了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地的吸引要素的资源开发, 以世界遗产目录中的 New Lanark 为实证研究对象, 并且对开发实例



中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对策; Light (1996) 在其研究中, 对与遗产旅游地相联系旅游事件(如旅游节庆活动)过程中的旅游者的行为特点进行了分析; Emma (1998) 等人借助感知理论评估了著名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地的解译系统; Yaniv (2003) 等人通过对研究区的详尽调查, 探讨了研究过程中涉及的评价指标, 详细讨论了个人性格、遗产的特征、知觉和认知、旅游者行为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

国内学者对于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方面同样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如郭英之(2003)对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的旅游者需求特征和游客的满意度进行了研究; 刘昌雪(2005)借助推拉模型理论, 对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推动和吸引要素展开了探讨; 张宏(2006)等以栅格分析法为理论依据, 展开了对世界文化遗产兵马俑景区旅游者的旅游体验的实证分析; 罗振鹏(2006)等调查和分析了北京故宫的游客服务现状, 得出故宫的游客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旅游服务的缺失和不完善。许立娇(2010)在她的学位论文中通过对表演艺术类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分析, 认为旅游为表演艺术类文化遗产提供了保护和发展的平台, 相较于其他类型遗产, 有较大资源优势; 闫丽丽、朱创业(2012)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模式研究》中, 以剖析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为切入点进行研究, 着重实现城市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的整合创新; 宋宇(2010)研究了辽宁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体系, 提出了统筹兼顾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开发的统一开发策略; 陈峰云等(2007)以平遥古城为例, 提出缓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之间矛盾的方法, 即扭转工作人员的消极保护, 依靠新颖的、创造性的新旅游开发方式。

综上所述, 国内外学者对于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的认识都是一致的, 即要对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进行深入分析, 并且不断提高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的水平和层次, 都认为这是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方向。文化遗产内涵的挖掘一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从遗产内涵和遗产价值的分析入手, 寻找最佳的展示文化遗产价值的方式, 可以更好地表现其文化内涵, 最终产生相当文化内涵和深度的文化遗产旅游; 二是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需要借助详细的客源市场的分析, 结合文化遗产游客的需求, 来促进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 不断提升产品的文化内涵水平。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 以上问题的交叉研究尚不够充分, 研究中运用的定量的研究方法还没有同定性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笔者将针对以上问题, 借助多种理论研究方法(如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将它们的研究视阈融合, 为文化遗产旅游地的旅游开发的研究做出有益的尝试。



1.2.2 龟兹文化研究综述

有关龟兹文化研究的专著并不少见，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直接以“龟兹”命名的论著，其中代表性研究专著有朱英荣先生的《龟兹石窟》，姚士宏先生的《克孜尔石窟探秘》，苏北海先生的《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刘锡淦、陈良伟先生的《龟兹古国简史》，冯斐先生的《龟兹佛窟的人体艺术》，龟兹石窟研究所主编的《龟兹艺术研究》和《龟兹佛教文化论集》等；二是以其他形式命题，但内容中有许多关于龟兹文化的专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常书鸿先生的《新疆石窟艺术》，阎文儒先生的《中国石窟艺术总论》，《新疆艺术》编辑部编的《丝绸之路乐舞艺术》和《丝绸之路造型艺术》，周菁葆先生的《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丝绸之路的艺术研究》《丝绸之路的宗教文化》，吴焯先生的《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林梅村先生的《西域文明》，孟凡人先生的《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余太山先生的《西域文化史》，穆舜英、张平、齐小山先生主编的《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张光福先生的《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等。

此外，有关龟兹文化研究的论文则散见于全国许多刊物中。其中龟兹史地学以向达先生、苏北海先生、薛宗正先生、余太山先生、刘锡淦先生、钱伯泉先生、侯灿先生等人的研究为代表；龟兹宗教学以任继愈先生、朱英荣先生、姚士宏先生、陈世良先生、吴焯先生、丁明夷先生等人的研究为代表；龟兹石窟考古学以阎文儒先生、常书鸿先生、宿白先生、晁华山先生、朱英荣先生、马世长先生、贾应逸先生、姚士宏先生等人的研究为代表；龟兹艺术学以潘怀素先生、谭树桐先生、张光福先生、谷苞先生、周菁葆先生、霍旭初先生、周吉先生、冯斐先生、袁廷鹤先生、徐建融先生等人的研究为代表；龟兹文物考古学以孟凡人先生、王炳华先生、张平先生、刘松柏先生等人的研究为代表。此外，有关龟兹地区人种学的研究以韩康信先生为代表，有关龟兹地区语言的研究以季羡林先生、林梅村先生为代表，有关龟兹地区的屯田研究则以赵予征先生为代表等。

龟兹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龟兹古国文明、龟兹与都护府、龟兹佛教文化、龟兹石窟艺术、龟兹音乐舞蹈和龟兹文物考古等方面，下面分类概括各命题的主要研究成果。

(1) 龟兹古国文明。

龟兹为西域大国，“龟兹”一词始见于《汉书》，在史书和佛经中又有多



种异译。

龟兹位于欧亚大陆深处，处西域中心地带，因远离海洋，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龟兹地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不同范围，一般说，大致西起乌什，东至轮台，北入天山山脉，南抵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龟兹是城郭国，有自己的城池，而且王宫壮丽。

从龟兹境发掘的古人类遗址表明，早在新石器晚期龟兹的先民们就在这块绿洲上从事农牧业生产，随着历史变迁，又有许多氏族、部落迁居龟兹，因此，各民族共同开发了这片地方，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龟兹文化。

龟兹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实行王权世袭制，国王姓白，头系彩带，坐金狮子床。其风俗是男女都剪发，惟国王不剪发。还有自己的刑法，杀人者死，劫贼断其一臂，砍掉一足。

龟兹物产、矿藏资源丰富，龟兹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要通道，规定税收准地征收，无地者则税银。商业的繁荣和发展，促进了货币的流通，除中原王朝的货币在龟兹流通外，龟兹在当地也用来铸造钱币。

龟兹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语言为乙种吐火罗语，使用的文字如《大唐西域记》载：“取则印度，粗有改变”。

（2）龟兹与都护府。

西汉统一西域后，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 60 年），在龟兹境乌垒（今轮台策大雅内）设置西域都护府，自此，西域纳入祖国版图。西域都护府是中央王朝派驻西域的最高军政权力机构，西域都护的职责除了监督西域各地的行政、征收赋税外，还统帅中央政府在西域地区的部队，并有权调遣西域各地的地方军队。同时，西域各地方政权的官员任职，要经过西域都护奏请，中央批准，才予册封，颁发印绶。两汉时期先后有 18 人任西域都护，如郑吉、段会宗、甘延寿等都名垂史册。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 640 年），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显庆三年（公元 658 年），移至龟兹。三年后，设龟兹、焉耆、疏勒、于阗四军镇（史称“安西四镇”）及 16 个都督府、88 州、110 县、126 个军府，把中原的州府县建制推行于西域。景云二年（公元 711 年），北庭升格为大都护府，与安西大都护府分治西域广大地区。

唐与吐蕃在西域进行争夺期间，曾几罢四镇，而后收复重置四镇。唐至德后，安西都护府改称镇西都护府。

（3）龟兹佛教文化。

佛教何时传入龟兹，具体时间已无从考证，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公元前后，即两汉之交佛教传入龟兹。至魏晋南北朝时，龟兹佛教已达鼎盛时期，



成为“丝绸之路”北道上的佛教中心之一。《晋书·列传·四夷》中载：“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同时，佛教文化造就了许多佛学大师和译经家，如魏甘露三年（公元 258 年），龟兹王世子帛延，就于洛阳从事译经工作；龟兹高僧，中国古代三大翻译家之一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三年（公元 401 年），在长安从事佛经翻译，先后译出经、论、传 300 余卷，对我国的佛教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唐代龟兹佛教仍很兴盛，《大唐西域记》载“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有汉僧主持的大云寺和龙兴寺。

9 世纪中叶，龟兹的回鹘人受当地佛教文化影响，也改奉佛教，库木吐拉石窟寺中，有些洞窟就开凿于龟兹回鹘国建立之后。宋辽时，佛教在龟兹地区仍很流行，宋景佑四年（1087 年），龟兹入贡时，曾得朝廷赐以“佛经一藏”。

龟兹最初流行小乘佛教，鸠摩罗什由小乘佛教转习大乘佛教后，大乘佛教在龟兹才广为流行。前秦吕光携鸠摩罗什东去中原，龟兹小乘佛教的势力又占了统治地位。唐武则天称帝后，大量汉僧由中原至龟兹，建立了由汉僧主持的大云寺、龙兴寺，汉僧则奉大乘佛教，致使大乘小乘两派并行。

14 世纪中叶，秃黑鲁·铁木儿建立了东察合台汗国，在他强力推行伊斯兰教的情况下，库车民众改奉伊斯兰教，自此，佛教在库车消亡。

（4）龟兹石窟艺术。

历史上，佛教在龟兹的盛行，使龟兹境内形成了许多石窟寺群，虽历经几千年的沧桑，至今龟兹石窟寺遗址还有：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玛扎伯赫石窟、博斯坦托格拉石窟；还有最近新发现的阿艾石窟；拜城县的温巴什石窟、克孜尔石窟；新和县的托乎拉克艾肯石窟等。这些石窟尚存洞窟 513 个，占新疆全部洞窟的六分之五。龟兹石窟保存壁画的有 166 个洞，其中克孜尔石窟寺壁画有近万平方米。龟兹石窟独具风格的窟形建筑形式，瑰丽多彩、风格纷繁多样、形象绰约的壁画风貌，栩栩如生的雕塑佛像，多种文字的题记，构成了光彩夺目的石窟艺术，成为佛教艺苑的一枝奇葩。

龟兹壁画有着非常纯熟的绘画技艺，龟兹画师采用“曹衣出水”“屈铁盘丝”“平涂晕染”以及“凹凸用色”等诸种绘画技法相互融汇，使人物画具有立体感、动感、质感。

龟兹石窟中的塑像从种类上讲，有佛陀造像、菩萨造像、涅槃造像、金刚力士造像、天王造像、罗汉造像；从风格上讲，佛陀造像“宝相庄严”，菩萨造像“慈祥”，金刚造像“勇猛”，涅槃造像“安详”，天王造像“威



严”，罗汉造像“各见本色”。从现存一些残破塑像分析，前期造像明显受犍陀罗、希腊艺术的影响，后期明显受中原艺术风格的影响。

（5）龟兹音乐舞蹈。

龟兹人民在漫长的生产斗争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龟兹乐”。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广为拓展，中西文化在龟兹的交汇，龟兹人民又在吸收中西音乐精髓的基础上，使“龟兹乐”得到升华，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因而得到唐僧给予的“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的高度评价。佛教的传入，使“龟兹乐”的有些乐曲又具有了佛教的色彩。“龟兹乐”由音乐、舞蹈、戏剧三部分内容组成。

“龟兹乐”对中原文化有极大的影响，自汉时已传入中原。宋代沈辽的《龟兹舞》诗称“龟兹舞，龟兹舞，始自汉时入乐府”。前秦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吕光破龟兹后，携带大批龟兹乐舞伎人东归。至隋，有“西国龟兹”“齐国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史称“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并使隋朝音乐“妙绝弦管，新声齐变”。诗人薛道衡写道“羌笛陇头吟，胡舞龟兹曲”，可知“龟兹乐”在隋朝的盛况。唐朝时，“龟兹乐”为《十部乐》之一，唐玄宗改为《立部伎》《坐部伎》后，在8种《立部伎》中，有5种采用“龟兹乐”，6种《坐部伎》中有3种采用“龟兹乐”。由此可知，“龟兹乐”在唐宫廷乐中所占的地位。

龟兹籍的音乐名人苏祇婆的“五旦”“七声”音乐理论，促进了中原音乐的变革。隋炀帝时，白明达任乐正，曾造新声、十四首乐曲，大大丰富了隋的宫廷音乐，唐时其任内廷供奉，创作了名曲《春莺啭》。

“龟兹乐”也影响了周边国家，隋唐时期，“龟兹乐”的乐器、乐曲、舞蹈传到朝鲜、日本、印度和越南等国，龟兹乐器和乐曲至今还在有些国家流传。

（6）龟兹文物考古。

古龟兹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汉唐时期，龟兹曾是西域都护府和安西都护府的治所，成为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库车遗存有极其珍贵的文物和古遗址。这些古文物和古遗址，是龟兹历史的见证，是龟兹文化的再现，它给我们解读和研究龟兹文化宝库提供了钥匙。如处在新、老城中间的哈拉墩的发现，给我们揭示了龟兹的史前文化；炼铁遗址、各种铜钱货币的发现，给我们研究龟兹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依据；佛教遗址，特别是大量的龟兹石窟寺的发现，为我们研究龟兹的佛教文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条件；曾引起世界学术界轰动的库车出土的焉耆-龟兹文写本（已被盗掠国外），使我们明确了龟兹土著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库车的文物遗址，是龟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研究龟兹文化的